

中东剧变、影响及其应对

民族身份认同对伊朗核政策的影响*

刘 慧

摘 要: 从2006年至今,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了四次制裁决议。尽管面临强大的国际社会压力,伊朗始终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条不紊地推进核技术的发展。在这场伊朗核问题的国际较量中,伊朗采取了强硬政策,即坚持发展核技术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该政策的出台包含决策者对诸多因素的考量,其中伊朗民族的身份认同及由其构建的文化价值观是其核政策的一个动因和强大的精神基础,必将影响伊朗核政策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 民族身份认同; 伊朗外交; 核政策; 文化价值观; 伊朗核问题

作者简介: 刘慧, 硕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讲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1)04-0033-07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项目资助。

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第1929号决议,意味着国际社会第四次因核计划对伊朗进行制裁。伊朗再一次被推到了国际压力的风口浪尖。从2003年初宣布发现并提炼出能为其核电站提供燃料的铀开始,伊朗和美欧等西方国家便围绕伊朗核计划展开了跌宕起伏的攻防战。几年来,伊朗经历了4次安理会制裁,并不时处于美国、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中。尽管如此,伊朗政府毫不让步,坚持自己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条不紊地发展自己的核技术:从开始低级别的铀转化到今天建立起较完善的核循环系统,并自主生产出20%的浓缩铀。

的确,因为核计划,伊朗在国际社会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国内的经济和发展也因为制裁而困难重重。那么,伊朗为何一定要发展核计划?面对严厉制裁,伊朗如何计算“收益”与“成本”?为何伊朗同西方的谈判举步维艰,却跟土耳其、巴西签订了核燃料交换协议?为何制裁不断,伊朗国内与西方斗争的民众士气却依旧不减?……伊朗核政策的出台是个复杂的过程,对于上述问题,学界可从不同角度可以加以解读。本文从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角度,以及从伊朗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层面来剖析伊朗核计划的动因及其决策。

一、伊朗民族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身的种族、国家、宗教信仰、社会地位、性别、职位等所属的归属确认,亦即是对“自己”和“他者”的确定。此个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民族国家。就民族国家而言,“其自身的统一性以及它相对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造就了它的身份,赋予了它在国际

社会中的主体地位。”^[15] 这种统一性和独特性来源于共同的文化和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从国家层面看，文化包括信念、价值观、规范、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构成了该国或该民族比较稳定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从而塑造民族国家这一国际行为体的身份归属——“我们是谁”。该理念决定了“我们”的敌人、对手和朋友的身份。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世界观，指导形成“我们”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方式——某种对外政策的偏好。

伊朗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古老的文明，是一个具有强烈身份感的国家。在诸多的文化类型中，整个伊朗民族有两个共同的文化结构：传统的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两种文化构建出了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即伊朗族群身份和穆斯林身份。2003年12月10日，伊朗妇女希琳·伊巴迪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向全世界骄傲地宣称“我是伊朗人，伟大的居鲁士的后代”以及“我是一个穆斯林”^①，明确地表现出伊朗人的这两种身份认同。从公元16世纪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被萨法维王朝定为国教、成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起，这两种身份认同就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渗透到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中。不同时期的当政者则根据需要侧重于强调其中的某种身份，为自己的统治和对外政策寻找合法性依据。从伊朗民族的起源来看，雅利安人是现代伊朗人的真正祖先。

“伊朗”（IRAN）是“雅利安”（ARYAN）一词的转译，意为“雅利安人的国家”。“雅利安”本意为“高尚的人”、“贵族”，历史上指集居在伊朗高原上的印欧语系东支的雅利安部落。今天的欧洲除了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俄罗斯有属于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后裔和混血外，其他几乎都是雅利安民族的后裔。因此，从民族起源上讲，伊朗人与大部分的欧洲民族是同源的。

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建立的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波斯帝国是伊朗民族永远的骄傲，几千年历史变迁从未切断伊朗人在内心同这个古代帝国的联系。无论是在社会制度、经济、文化还是军事方面，波斯帝国都曾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无可比拟的辉煌成就。正是那些辉煌与荣光，成为伊朗人在历史逆境中依然不断追求民族强大的动力。

伊朗人的这个族群身份认同被伊斯兰革命前的巴列维政府充分利用，为了使君主政体合法化和为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寻找依据，巴列维政府强调古代伊朗的身份特性，用一种浪漫的诠释将伊朗人自身定义为一个优越的雅利安民族，以共同的语言起源与欧洲联系起来，与阿拉伯—闪族区分开来，以此否定穆斯林势力提出的伊朗伊斯兰化。1971年，巴列维国王在波斯波利斯举行庆祝波斯帝国2500年的大典，决定取消伊斯兰太阴历，怀着复兴古波斯的辉煌、建立最终的“伟大文明”的梦想，把伊朗的穆斯林身份认同从波斯—雅利安身份中外化出去。这种伊朗民族的身份认同使巴列维政府宣称的同西方世界的“自然”联系合理化。“把伊朗的身份认同于西方，即雅利安国家，就允许接受西方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输入，允许伊朗去适应西方国家的模式。”^[2]

然而，随着美国对伊朗内政的严重干涉，20世纪六十年代起，伊朗反对君主制度的抗争运动者和知识分子要求重新确认国家身份和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同世界的关系。“如果决定伊朗民族局限性的基础是雅利安因素，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倾向于西方世界。但在我们民族和政治任务中，这种倾向包括了屈服和影响，以及同邻居的非雅利安和反西方的穆斯林国家的严重隔离。如果我们选择过去14个世纪的知识、行为和社会遗产作为我们国家的基础，我们会有不同的任务和其他的代价，这样，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将成为我们的朋友。”^{[3]22} 在这个过程中，对伊朗人自我认识和同西方关系的改变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人物是伊朗什叶派重要理论家阿里·沙里亚提。沙里亚提在《回归自我》中强调，伊朗作为一个国家真正身份特性的发现，要求拒绝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外国意识形态，恢复到真正的伊朗——伊斯兰自身。

巴列维国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唤起民众帝国梦想的同时，却试图剥离伊朗人的宗教身份认同，一直努力在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中削弱宗教和教士的影响力，最终失败并失去了政权。

^① 2003年12月10日，伊朗女律师希琳·伊巴迪获得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她在颁奖仪式上强调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身份。参见 http://www.writespirit.net/inspirational_talks/talks_shirinEbadi/speeches_shirinEbadi/view。

在伊朗，宗教不仅仅是个人信仰，更是伊朗民族文化的核心，它提供了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规范。二千多年来，伊朗宗教一直与政权相辅相成，构成政教合一的文化特性。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宗教——琐罗亚斯德教^①和什叶派伊斯兰教均在不同时期被奉为国教，宗教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与精神支撑。在政权的扶持下，规范民众的生活，塑造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宗教信仰与虔诚深深渗入社会生活的底层，凝结为公众社会心理。宗教虔诚一旦成为民族文化的精神所在，民众对宗教身份的认同是很难削弱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在《宪法》12条中明确规定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所有的法律法规，包括民法、刑法、财政、经济、行政、文化、军事和政法等全部必须建立在伊斯兰的准则上。这样，什叶派伊斯兰教转化为掌控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神权政府开始偏重于强调伊朗民族的伊斯兰身份：伊朗人民的首要共同身份是穆斯林。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兄弟。这种身份认同将“自己”与“其他人”界定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伊斯兰的利益成为伊朗民族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东地区，伊朗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派。人种上，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雅利安人后裔，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闪族人后裔；宗教上，伊朗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少数派——什叶派宗教，而中东国家的主流是逊尼派，什叶派从产生之日起便处于受迫害的地位。同时，历史上伊朗民族也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经历了亚历山大、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入侵，近现代以英国、俄罗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干涉和殖民统治，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什叶派阿舒拉的殉难精神与伊朗民族的经历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伊朗人的“被压迫者”和“受害者”的自我认识。这种颇具悲情色彩的意识，最终造就了伊朗民族敏感独立、不怕牺牲的个性。

二、身份认同对伊朗核政策的影响

伊朗民族的两种身份认同——波斯人和什叶派穆斯林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联系在一起。不同时期，统治者根据建立和维护政权的需要，会偏重于强调某种身份归属，并把这种归属认同加入到法律、政治和社会结构中，使之制度化，从而指引国家的政策行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初期，霍梅尼确立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该政策包含了以伊斯兰准则为核心的独立、反霸、不结盟的三大原则，充分体现了伊朗新政府对宗教身份的定位以及对独立自主的诉求。这些原则也同样指导着核政策。

伊朗的核计划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1979年革命之后，新政权一度停止了该计划。八十年代中期，内外交困的伊朗秘密重启核计划，直至2002年，伊朗纳坦兹核设施被美国卫星拍到，伊朗的核计划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后，在核问题上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政策，加快核技术的研发。伊朗的核政策本是伊朗的内政政策，但伊朗发展核能的“核计划”演变成为国际社会的“核问题”，甚至恶化成“核危机”之后，核政策变成伊朗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伊朗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开始了核计划的“发展”与“遏制”的外交较量。在这场集政治谈判、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的较量中，伊朗始终坚持自己的发展立场，并为此付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代价。在强硬政策的背后，除了伊朗领导人对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的考虑外，伊朗民族的身份认同所构筑的集体心理也是领导人考虑和利用的重要因素。

^①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之一，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曾被伊斯兰教徒贬称为“拜火教”，在中国称为“祆教”。它是一种二元论的宗教，主张善恶二元论，犹太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受它很大的影响。目前在伊朗偏僻山区和印度孟买一带的帕西人（Parsi）中仍有很大的影响。琐罗亚斯德（前628～前551年）是该教的创始人。

（一）民族自尊、独立敏感性与启动和坚守核计划的动因

“居鲁士的后代”身份赋予伊朗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支撑起伊朗民族的大国梦想。今天的伊朗已不复往昔的繁荣，但无论是巴列维时期的“重建波斯帝国”雄心，还是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立志成为伊斯兰世界中心的政策，复兴过去的辉煌一直是伊朗民族的梦想。民族自豪感使伊朗不惜代价地寻求“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的权利，从而实现自己的民族尊严。历史的灾难令伊朗人对自己国家的独立非常敏感。对伊朗人来说，民族的尊严是他们独立的保障，“任何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批评是可以容忍的，但是那种批评不能来自一个外国国家或者势力的代表，伊朗人很清楚这一点，也会很好地保护这一点。”^{[4]231}

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独立的敏感性决定了伊朗同其他国家交往的原则，即否定一切外来控制。任何其他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的自傲自大态度是决不能容忍的。霍梅尼告诫民众：“我们不允许任何势力对抗我们，掌握我们的命运。”^{[4]230}哈梅内伊在谈及伊朗外交政策的方针路线时指出，尊严、智慧和利益是伊朗外交政策必须要注意的三项原则，尊严是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的，真主并没有为异教徒统治穆斯林开辟道路。可见，伊朗传统的民族身份在历史的沉浮中锤炼出自尊、自傲和渴求独立的民众心理，为领导人考量自己的政策制定提供了认同基础和价值评判标准。在核问题上，自尊、自傲和对独立的敏感是政府启动和坚守核计划的一个内在动因和支持。

发展核能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实现其恢复古波斯帝国的荣耀与称霸地区的雄心的重要途径。他要将伊朗建设成继美、苏、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强国。1974年3月，巴列维公布了他的核规划：在1994年建成总能量为2300万千瓦的核电站，相当于23个目前的布什尔核电站，当年6月他在巴黎对媒体公开表示伊朗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核武器：“伊朗无疑可以在人们无法想象的短时间里拥有核武器。”^①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重启核计划，最主要的动力是想使陷入孤立的伊朗重新强大起来，以求得自己的安全保障。正如前总统哈塔米所言，“我们想变得更强大，强大就意味着拥有先进技术，而核技术则是所有技术中最先进的。”^{[5]12}数十年来，伊朗的核计划从无到自主产生出20%的浓缩铀，所取得的成就满足并激发了伊朗人的民族自豪感。2007年，伊朗政府把“4月8日”定为“国家核技术日”，以后每年都举行隆重的活动来庆祝这个铀浓缩成功的日子。

然而，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核计划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烈抵制，这种抵制触及了伊朗人的敏感底线。在伊朗人看来，首先，发展核技术是伊朗民族的合法权利，也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掌握核能是伊朗民族迈向进步巅峰的第一步。”^②伊朗领导人在公众场合反复申明这一点，同时驳斥西方国家对它发展核武器的指控。这样，伊朗把自己放在了道德的高点，正义的一方；其次，伊朗的核计划完全是伊朗的内部事务，西方国家对伊朗核计划的干预就是对伊朗内政的干预。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及以色列核计划上采取的双重标准更加重了伊朗人在这方面的疑虑，使他们觉得这些国家的根本目的在于控制伊朗，不希望伊朗拥有先进技术。哈梅内伊明确告诫民众：核问题已经是伊朗全民族和超越派别利益的国家核心问题，如果在核计划问题上退缩将破坏国家独立，伊朗民族将付出巨大代价。在强大的民众认知支撑下，跟伊朗政府提先停止铀浓缩再谈判的条件是不可能的，更别说要求伊朗放弃发展核技术。

既然国家的核计划是合法的，关乎国家尊严和民族独立，那么按照伊朗人的逻辑，是否发展核技术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谈判，“伊朗民族不会就自己的命运和合法权利与他人进行谈判。”^③

① 伊朗前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于1974年6月访问法国时，对媒体公开表明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意图，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1/21/content_4080620_1.htm。

②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2006年4月28日在伊朗赞疆省发表的讲话，参见 <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news/06-04-28/06042801.htm>。

③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2006年6月8日视察伊朗加兹温省时发表的讲话，参见 <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news/06-06-08/06060809.htm>。

（二）身份认同确立的敌我观与核谈判中的信任倾向

当代伊朗政府强化伊朗民族的什叶派伊斯兰身份，穆斯林兄弟是当仁不让的“自己人”。捍卫所有穆斯林的权利，对所有穆斯林尽兄弟般的义务是伊朗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宣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永远都是世界自由穆斯林的支持者和避风港。”^{[4]172}除了穆斯林之外，全世界所有同伊朗有着相似经历的受压迫、受掠夺的民族也都是伊朗支持和帮助的对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伊朗人心目中传统的霸权主义者。在近现代，伊朗一些重要的民族运动都因西方力量的干涉而遭受失败，伊朗人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和威胁感，“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一些民族还处于压迫者的枷锁之中，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遇着以弱肉强食为法度的政权……我们在这样一个地区生活，这里大部分的统治者听从美国的指挥，给予以色列和伊拉克复兴党合法地位，而他们正竭力破坏伊斯兰和伟大的《古兰经》。”^{[6]160}

反对霸权，获取独立，唯一的途径就是斗争，“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独立的，除非它同霸权斗争并追随伊斯兰”^[7]。这种阵营鲜明的斗争观起源于伊朗人传统的世界两分法最早源于古代波斯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它把宇宙万物分为善恶二元，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善恶的斗争史，最终善战胜恶，光明代替黑暗。霍梅尼把善恶之战扩大到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根据他的理论，伊朗代表了正义，以色列以及同伊朗敌对的西方国家是恶魔，伊朗同霸权主义的斗争就是正义与恶魔的斗争。这是伊朗激进的反霸外交政策的价值观依据。同时，伊朗人几个世纪以来被践踏的民族自豪感也在与外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满足。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基本都体现了这种爱憎分明的敌我观。在关于停止铀浓缩和核燃料交换等问题的谈判中，伊朗与西方社会始终互不信任，无法达成一致。美英等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强压，很容易激起伊朗人的历史记忆，使他们联想起 20 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为了寻求自己在伊朗的石油利益，支持国王推翻摩萨台民选政府的事件。在伊朗人看来，今天美国也同样为了自己的中东利益而试图阻止伊朗的强大，“敌人担心的不是制造核弹，在当今世界上核弹已经没有效用，敌人的主要担心是伊朗民族的自主能力和知识。”^①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在核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即伊斯兰革命前后对伊朗核计划的不同态度，对以色列核计划与伊朗核计划的不同态度，让伊朗人更加确信这个判断。所以，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的停止铀浓缩、核燃料运送至俄罗斯进行境外交换等方案，伊朗坚决否定。伊朗的逻辑是，当伊朗停止铀浓缩，依靠从俄罗斯、法国等西方国家进口核燃料的时候，本国发展核技术的主动权就落在了西方国家的手中，这是极大的冒险，归根结底，美、英、法、德甚至俄罗斯都不是伊朗可信任的对象。伊朗民众的世界观和历史经历使他们对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侵害过伊朗的国家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

2010 年 5 月，伊朗核问题意外出现转机：伊朗同土耳其和巴西签署了“德黑兰协议”^②，同意将约 1.2 吨纯度为 3.5% 的浓缩铀运往土耳其，以交换 120 公斤纯度为 20% 的浓缩铀。土耳其和巴西为什么能够成功填补伊朗与西方国家间的“信任鸿沟”？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同时也是一个与伊朗接壤的伊斯兰国家，两者在信仰、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尤其是近两年来，土耳其与伊朗在巴以问题上有着相近的看法。在核问题上，土耳其采取了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立场。伊朗议长拉里贾尼直言“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内贾德则用“牢固的兄弟”来形容两国的关系。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相似性使伊朗相信同穆斯林人民更能达成一种利益上的共识和理解。

巴西作为“金砖五国”之一，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充当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它身处美国的后院，却在许多问题上与美国唱反调。巴西奉行的独立自主政策受到同样致力于独立自主

①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2006 年 2 月 15 日参观纳坦兹核工厂时的讲话。

② 2010 年 5 月 17 日，伊朗与巴西、土耳其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就解决伊朗核问题签署协议。协议承诺，伊朗将把 1200 千克纯度为 3.5% 的浓缩铀运往土耳其境内。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将在一年内得到在俄罗斯和法国加工提纯的 120 千克浓度为 20% 的浓缩铀，以从事医学研究和作为核电燃料使用。

外交的伊朗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哈梅内伊会见巴西总统卢拉时强调：“合作及发展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改变世界秩序不平等状况的唯一途径”。德黑兰协议的签署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新途径。在伊朗同西方国家无法互信的情况下，更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尤其能得到伊朗民族信任的国家参与到这个谈判中，对解决伊朗核问题或许会有实效。

（三）受害者心理和国家利益的界定

近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严厉措施来改变伊朗获得核武器的“代价与利益之间的计算结果”^①。伊朗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安理会的制裁使得伊朗物资进口困难，国内物价飞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伊朗政府对付核危机的政策简单而明确：抵抗并愿意付出代价。这一政策的背后是伊朗民族对“代价”和“利益”的权衡，包含了伊朗人由受害者心理而激发的牺牲精神和民族力量。

伊朗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传统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维护伊朗国家制度的伊斯兰性质和伊斯兰价值观、民族自尊等精神利益。核技术不仅是伊朗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实现民族自尊、“维系伊朗社会凝聚力和在国际地位所必需的”^[8]。前总统哈塔米清楚说明了核计划对伊朗的重要性：“我们回答是否和平利用核技术，就是一个字‘是’。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威信所在。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战略。不过如果他们（美国人）否认我们发展和平核项目的基本权利，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就准备为这一项目付出代价。”^②

2006年来的前3次安理会制裁协议都没有实效，反而强化了伊朗人受压迫的心理，增加了伊朗民众反美的决心。与美国斗争的悲壮气概迎合了伊朗民众的心理需求：寻求公正，不畏牺牲。

“牺牲精神”是作为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朗人最崇尚的价值观。什叶派从产生之日起便处于受迫害的地位，一直在为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力而不懈地斗争着。伊玛目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牺牲的经历被伊朗人所推崇。在他们心中，侯赛因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为伊朗社会树立了追求真理和伊斯兰目标的精神榜样——不畏强暴、敢于牺牲、为正道而献身、虽死犹生。这种牺牲促使什叶派穆斯林必须把宗教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是伊朗承受国际压力，面对经济、政治困境时的精神支柱。两伊战争期间，霍梅尼就以此号召伊朗人民要坚持战斗，“如果我们同美国或其他超级大国达成协议，我们就不会经历如此艰辛，但是我们的人民准备接受这样的不体面，宁愿死也不愿生活在耻辱中。我们准备去死，并向真主承诺，我们将追随我们的伊玛目侯赛因，把同伊拉克的战争一直继续下去，直到获得真正的独立。”^{[9]19}

在核问题上，现任总统内贾德也充分利用了“不怕牺牲”这一精神武器，号召民众竭尽全力为民族的合法权利和追求正义而斗争，不在任何条件下屈服于压迫和威胁，为伊朗对抗国际制裁和压力奠定了民众基础和精神支柱。

三、结语

内贾德政府核政策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将科技领域的核问题变成了伊朗民族尊严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在哈塔米总统时期，国际社会、甚至伊朗国内民众对伊朗核计划知之甚少。内贾德当选总统后，通过各种场合的演讲向全民宣传国家核技术的发展目的和成果，充分调动起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利用民众心理来支撑强硬的核政策，在国内建立自己的威信。但也正是这一点使伊朗的核计划成为不能倒退的火车。就在内贾德将核问题民众化的同时，也降低了核政策的灵活性。在激起如此强大的民众支持后，无论是内贾德，还是任何一个其他将成为伊朗总统的人，都不可能在此问题上选择后退。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能通过更换伊朗领导人来使伊朗放弃核计划的如

① 2006年4月13日，美国前负责政治与军事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伯特·艾因霍恩谈及伊朗核问题时如此表述。

② 2004年8月当时的哈塔米总统关于伊朗核计划所作的表述，参见 <http://news.qq.com/a/20040814/000063.htm>。

意算盘恐怕是要落空的。在国际社会未用完全公正和透明的态度来对待伊朗之前，很难指望伊朗在核谈判中能做出实质性的立场转变。而 2011 年 3 月底开始的多国部队对主动放弃核计划的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或许将成为伊朗政府的前车之鉴，强化他们的拥核决心。

2011 年 3 月，日本的大地震造成核泄漏，同样引发了伊朗民众对布什尔核电站安全的高度关注和对核计划必要性的疑虑。为了消除民众的担忧，内贾德总统和政府官员反复强调，布什尔核电站在建造过程中使用的是全新技术，比日本核电站更安全，还表示政府一直把核电站的安全置于首位，不会着急并网发电。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伊朗政府的核计划在未来不仅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压力，还面临着严峻的核安全考验及国内民众对其安全性的质疑。如何在核安全问题上获取民众信任，让民众一如既往地支持核计划，对伊朗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戴晓东. 民族认同与全球化. 国际关系与认同政治[M].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6.
- [2] Arshin Adib-Moghadaam. Islamic Utopian Romanticism and the Foreign Policy Culture of Iran[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05(14).
- [3] 米尔扎·蒙塔赫里. 为伊斯兰与伊朗服务(波斯文版)[M]. 德黑兰: 萨德拉出版社, 1984.
- [4] 艾哈迈德·纳吉布扎德. 民族文化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波斯文版)[M]. 德黑兰: 伊朗外交部出版社, 2003.
- [5] 王恩学, 张金平. 伊朗的强硬“核外交”政策[J]. 现代国际关系, 2006(4).
- [6] 霍梅尼. 纯粹的伊斯兰[M]. 德黑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出版社, 1989.
- [7] 霍梅尼. 论伊斯兰教[EB/OL]. [2007-08-09].<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news/06060809.htm>.
- [8] 周进勇. 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阿斯噶汉尼——核武是维护伊朗国家利益的利器[N]. 南方都市报, 2009-11-03.
- [9] Kalim Siddiqui. Imam Khomeini's Message to the Majles[M]. Tehran: The Open Press, 1982.

The Eff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on Iran's Nuclear Policy

LIU Hui

Abstract Since 2006,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has passed four resolutions on sanctions o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Despite the strong international pressure, Iran has always insisted on the right of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and also promoted the nuclear technology in an orderly way. In this international context, Iran has adopted a tough policy: persisting in developing nuclear technology and being ready to pay any price. This policy is the result of many considerations made by the decision-makers. The Ir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values are the motivation and strong spiritual foundation of Iran's nuclear policy, and will also affect the futu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Iran's Foreign Policy; Nuclear Policy; Cultural Values; Iranian Nuclear Issue

(责任编辑: 李 意)